

# 语言态度、语言环境与农村学前 留守儿童语言使用

李金凤<sup>1</sup> 何洪峰<sup>1</sup> 周宇亮<sup>2</sup>

(1. 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4;

2. 中山大学珠三角改革发展研究院 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 本文以江西省湖口县 679 个农村学前留守儿童为样本,运用 Probit 模型实证分析语言态度、语言环境对儿童语言使用的影响。发现:(1)父母要求监护人使用普通话带小孩,父母经常与监护人保持电话或网络联系并督促监护人和小孩使用普通话,均能有效促进儿童使用普通话。(2)监护人的方言习惯越强,儿童越倾向于使用方言;儿童的玩伴使用普通话,对儿童使用普通话没有明显的影响作用。(3)父母要求监护人使用普通话带孩子时,监护人的方言习惯对儿童方言使用的作用会变弱。因此,父母要求监护人使用普通话,经常与监护人和儿童保持联系并督促其使用普通话,是农村学前留守儿童普通话普及中的关键因素。

**[关键词]** 语言要求;语言监督;方言惯性;学前留守儿童;普通话使用

**[中图分类号]** H1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397(2017)01-0023-09

## Language Attitude, Language Environment and Language Use of Preschool Left-Behind Children in Rural Areas

LI Jinfeng, HE Hongfeng, ZHOU Yuliang

**Abstract:** This study builds Probit models to mak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s of language attitude and language environment on children's language use based on the 679 preschool left-behind children in Hukou County, Jiangxi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Children's use of Mandarin is actively encouraged when parents ask guardians to speak to children in Mandarin, and when parents keep contact with the guardians

**[收稿日期]** 2016-10-24

**[作者简介]** 李金凤,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博士,主要研究现代汉语语法、社会语言学;何洪峰,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现代汉语语法;周宇亮,中山大学珠三角改革发展研究院博士后,主要研究经济社会学。

through telephone or internet and supervise the use of Mandarin by guardians and children. (2) Children are more likely to use dialect when the guardians are more accustomed to dialect; use of Mandarin by playmates has no obvious impact on children's use of Mandarin. (3) The effect of guardians' dialect habits on children's use of dialect will become weak when parents require the guardians to speak to children in Mandarin. Therefore, it is crucial for parents to require guardians to use Mandarin, and keep in close touch with guardians and children and urge them to use Mandarin.

**Keywords:** language requirements, language supervision, dialect inertia, preschool left-behind children, Mandarin use

## 一 引言

当前,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留守儿童现象,留守儿童的诸多问题中,普通话学习和使用问题往往被忽视,国内学术界对该类问题的关注较为缺乏。伏干(2016)以江苏省阜宁县中小学生学习留守儿童为样本,建立 mlogit 模型,研究了年龄、性别、父母是否外出打工等因素对农村留守儿童在学校和家庭中使用普通话还是方言的影响作用。该文定量分析了农村留守儿童这类特殊的弱势群体的语言使用现状、相关影响因素,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思路。但该文有两点不足:一是对留守儿童语言使用的影响因素的选择不够全面,缺乏深入的探讨;二是样本中未包含学前留守儿童。基于此,本文选择江西省湖口县的农村学前留守儿童为样本,对更多影响儿童语言使用的因素进行分析,以充实该领域的研究。

选择学前留守儿童为研究对象,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该类儿童最早经历语言输入、吸收和转化的过程,影响其语言学习的因素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以后的语言使用能力。如,文湘兰(2013)、邓玉清(2016)等研究表明,1~3岁留守儿童普遍存在着语言发育迟缓的现象,姜玉荣、蓝雯倩(2016)的调查表明,4~6岁的农村留守儿童的语言认知能力不足。这种现象直接导致儿童入学后语言沟通能力上的障碍(周家玉,2014)。因此,提高该类儿童语言(尤其是普通话)学习和教育的水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第二,客观实际显示,当前有一些农村学前留守儿童在生活中习惯使用普通话,这些儿童操一口普通话生活在方言环境中,其背后的原因是耐人寻味的。

本文进行大量实地调查,一是要了解农村学前留守儿童的语言使用现状、普通话使用的影响因素;二是期望为农村学前留守儿童普通话普及提供理论上的参考,以促进该类群体的普通话教育发展。

## 二 样本数据

本文数据全部来源于实地访谈。访谈团队由15人组成,充分利用当地的社会网络关系,由调研实施者与学前留守儿童家庭成员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并从交流内容中提炼出所需数据。为了获得较好的访谈效果,访谈团队人员全部受过高等教育或正处于大学、研究生在读阶段。根据访谈团队的家庭具体住址,调研数据来自湖口县下辖的双钟镇、流泗镇、凰村乡、武山镇、流芳乡和马影镇,包括乡镇街道与村落的学前留守儿童家庭。

调研分为两期,第一期从2016年1月10日~2月17日,即处于学校寒假期间,寒假期间,

绝大多数留守儿童父母均回家过年,但本文仍然视其为留守儿童家庭。第二期从2016年7月1日~8月26日,处于暑假期间。第一期调研中,调研团队全体成员均参与了实地访谈,数据于3月底整理完毕,该期共访谈622个家庭,经记录后,整理出526个有效样本。第二期调研中,由于部分团队成员工作或学习缘故,只有6人参与了访谈,数据于9月底全部整合、整理完毕。该期共访谈187个家庭,有效样本为153个。同时,还电话追踪了第一期调研的526个有效样本,但只得到446组完整有效的数据。两期有效样本共计679个,数据有效率为87.6%。部分访谈无效的原因是,有些家庭提供不了我们需要的信息,或实施访谈者因遗忘造成信息遗漏等。

被试的家庭中,学前留守儿童的监护人主要是爷爷、奶奶,这类情况占比90.5%,其他的监护人包括外公、外婆、叔叔、姑姑、姨等各种类型。寒假期间,访谈的对象主要是监护人、父母、儿童三方,暑假期间,访谈的对象则以监护人和留守儿童为主。访谈的目的是了解留守儿童的年龄、性别等各种内外因素,以及儿童主要使用普通话还是方言等信息。

本文界定:(1)主讲普通话是指儿童整体上倾向于使用符合普通话发音和语法规则的字、词、句子;主讲方言则反之。但调研中也发现,监护人、父母、儿童的语言使用特征无明显的普通话或方言倾向,使得访谈实施者难以判别该儿童主讲普通话还是方言,该类情况则一律视为主讲方言。(2)家庭是指以学前留守儿童为核心的、包括祖辈或其他监护人、父母在内的单位。如果该留守儿童有学前亲兄弟姐妹亦留守在家的,仅视为一个调查对象。(3)不对监护人为外地人且不会讲湖口话的家庭进行调查。(4)父母均在外务工的儿童才属于留守儿童,父、母、父和母统称为父母。

### 三 描述性统计分析

#### (一) 语言使用现状

表1 生活与幼儿园学习中的语言使用

语言使用	生活中		幼儿园学习中	
	人数(人)	比例(%)	人数(人)	比例(%)
主讲普通话	182	26.8	363	89.6
主讲方言	497	73.2	42	10.4

表1显示,在生活中,主讲方言的儿童明显更多,比例达73.2%,说明方言在农村学前留守儿童的家庭日常生活中的使用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在没有考虑既使用方言又使用普通话的情况下,仍然有四分之一左右的儿童以普通话为常用语言,也反映了普通话在我国农村的普及力度正在加强。而全样本中,只有405名儿童进入幼儿园的学习阶段,其中有近九成的儿童在学习主普通话,主讲方言的只有10%左右,说明幼儿园是儿童学习普通话的好场所,而生活中,大部分儿童仍然选择主讲方言。

#### (二) 年龄

表2 1~3岁与4~7岁儿童的语言使用

语言使用	1~3岁		4~7岁	
	人数(人)	比例(%)	人数(人)	比例(%)
主讲普通话	76	20.8	106	33.9
主讲方言	290	79.2	207	66.1

表2显示,1~3岁儿童中,主讲方言的比例更大,高出4~7岁主讲方言的儿童13个百分点。4~7岁儿童主讲普通话的比例比1~3岁儿童相对更高,可能与该年龄段儿童接受了幼儿园教育以及普通话学习能力更强有关。

**(三) 性别**

表3 不同性别的语言使用

语言使用	女		男	
	人数(人)	比例(%)	人数(人)	比例(%)
主讲普通话	111	35.4	71	19.5
主讲方言	203	64.6	294	80.5

表3显示,主讲普通话的女童人数比男童多出40人,占比高出近16%,反过来,主讲方言的男童高出女童91人,高出比重相同。女童更倾向于使用普通话,这可能与父母及监护人的重视、女童学习语言(普通话)的能力更强(Maccoby & Jacklin,1974)有关。

**(四) 父母的使用语言**

许多研究表明,父母对儿童的语言学习和使用有着强烈的影响作用,无论儿童在学习过程中扮演着被动(Arunachalam,2016)还是主动的(Atkinson,1982)角色。当父母不在儿童身边时,监护人在形式上则等同于父母的角色。表4~6的统计结果体现了语言环境在儿童语言选择与使用中的作用。

表4 父母主讲普通话或方言情况下儿童的语言使用

语言使用	父母主讲普通话		父母主讲方言	
	人数(人)	比例(%)	人数(人)	比例(%)
主讲普通话	121	64.4	61	12.2
主讲方言	67	35.6	430	87.8

表4按照父母主讲普通话还是方言这一标准,将父母分为“主讲普通话”和“主讲方言”两组,这两组分别为188对和491对。统计结果表明,父母主讲普通话或方言对儿童的语言选择有明显的影响作用。主讲普通话的父母,其子女主讲普通话的人数远远超过父母主讲方言的,前者对应的人数和比例分别为后者的两倍和五倍左右;而主讲方言的父母,其子女主讲方言的比重非常高,达到87.8%。这就解释了农村里许多异地婚配(也包括少量本地婚配)的父母,其子女明显较多地使用普通话的现象。然而,主讲普通话的父母,其子女仍然有三成左右的主讲方言,原因主要是父母未要求监护人使用普通话带小孩、监护人习惯于使用方言、农村方言环境的影响等;反之,主讲方言的父母,其子女也有12.2%的主讲普通话,这可能与父母的普通话要求等因素相关。

**(五) 父母的语言态度**

表5 父母要求监护人和儿童使用语言情况下儿童的语言使用

语言使用	要求使用普通话		要求使用方言		无要求	
	人数(人)	比例(%)	人数(人)	比例(%)	人数(人)	比例(%)
主讲普通话	167	90.3	10	2.3	5	7.5
主讲方言	18	9.7	417	97.7	62	92.5

表5按照父母是否要求监护人和儿童使用普通话或方言这一标准,将父母分为“要求使用普通话”“要求使用方言”和“无要求”三组,调查发现,有185对父母要求监护人和儿童使用普通话,有427对父母要求使用方言,还有67对父母无要求。调查显示,希望儿童使用方言的

父母占多数,比重为 62.9%。

从表 5 可以看出,父母的语言要求在很大程度上积极影响着儿童的语言选择与使用,父母要求使用普通话时,儿童主讲普通话的比例为 90.3%;要求使用方言时,儿童主讲方言的比例更是高达 97.7%。而父母没有明显要求时,儿童的语言选择往往由监护人的语言使用习惯决定,事实上监护人基本上使用方言,因而该情形下儿童使用方言的比例也非常之高。

#### (六) 监护人的方言习惯

表 6 监护人习惯使用方言情况下儿童的语言选择

语言使用	习惯使用方言		习惯使用普通话	
	人数(人)	比例(%)	人数(人)	比例(%)
主讲普通话	150	23.3	32	88.9
主讲方言	493	76.7	4	11.1

表 6 按照否习惯使用方言这一标准,将监护人分为“习惯使用方言”和“习惯使用普通话”两组,调查发现,两组人数分别为 643 人和 36 人,表明农村学前留守儿童的监护人基本上习惯使用方言。统计结果显示,监护人习惯使用方言,儿童选择主讲方言,比例为 76.7%;监护人习惯使用普通话,儿童则选择主讲普通话,占比 88.9%。可以看出,监护人的方言习惯对儿童的语言选择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然而,监护人习惯使用方言时,仍有近四分之一的儿童主讲普通话。

## 四 实证分析

### (一) 变量设计与测度

#### 1. 被解释变量

参考伏干(2016)对农村儿童语言使用情况的因变量设置,结合学前儿童的实际情况,本文只选取“主讲方言”和“主讲普通话”作为农村留守儿童的选择结果,且着重分析儿童生活中的语言使用,不研究儿童的幼儿园学习、媒体学习等特定情境中的语言使用。在主讲方言中,掺杂少量的普通话,视作方言选择;在主讲普通话中,掺杂少量方言,视作普通话选择。因此,不存在“两种话都讲”的情况。并将语言使用(YYSY)设定为 0-1 虚拟变量,1 代表主讲普通话,0 代表主讲方言。

#### 2. 解释变量

我们定义主要的解释变量为语言态度(YYTD)和语言环境(YYHJ)。其中,语言态度是针对儿童父母设定的变量,包括语言要求(YYYQ)和语言监督(YYJD)两个子变量。语言要求是指父母要求监护人与儿童之间以普通话进行沟通,如果一方坚持使用普通话,另一方坚持使用方言,且相持不下的情况,则以监护人的选择为准。如果父母一贯的主张是要求监护人与儿童讲普通话,赋值 1,无要求或态度含糊,则赋值 0。语言监督是指父母不定期与监护人联系,督促监护人使用普通话。如果父母使用普通话与儿童进行交流,就以平均每月与儿童打电话或视频的次数量度之,如果父母使用方言,则赋值 0。语言环境包括监护人的方言惯性(FYGX)和儿童的玩伴的语言使用(WBY)两个子变量。方言惯性是指监护人习惯使用方言的程度,不同的监护人的语言惯性程度不同,对孩子变量采取 Likert 五点量表法进行测度。玩伴语言使用是指与儿童关系最好或来往最为频繁的小伙伴的普通话使用情况,我们假设玩伴使用普通话会对该儿童的普通话使用造成很积极的影响。当与该儿童关系最好的玩伴中有使用普通

语的,赋值1,否则,就赋值0;玩伴为0时,则直接赋值0。

### 3. 控制变量和工具变量

本文控制儿童的年龄和性别、监护人的阅历和受教育程度、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等基本信息变量。还控制父母之间的使用语言、家庭人均年收入、儿童在家乡外的娱乐活动等变量。除此之外,考虑到语言监督变量与误差项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如有些儿童的父母由于职业特点等原因,较多地回老家看孩子,从而可以面对面地督促监护人和儿童使用普通话。本文参考 Herrera 和 Minetti(2007)的工具变量设置方法,选择父母在过去的一年里月平均回家看孩子的天数作为工具变量,如遇到变量出现缺失值时,对该变量赋予一个大于0的极小值(0.001)。

## (二) 实证结果

### 1. 模型建立

结合描述性统计分析和本文研究需要,本文建立异方差的 Probit 模型,来分析语言态度、语言环境对农村学前留守儿童主讲普通话的影响,如式(1)所示:

$$Probit(YYSY) = \alpha + \beta_1 \ln(1 + YYQ)_i + \beta_2 \ln(1 + YYJD)_i + \beta_3 FYGX_i + \beta_4 \ln(1 + WBYY)_i + \gamma C_i + \varepsilon_i \tag{1}$$

式(1)中, $i$ 为访谈样本的个数, $\alpha$ 为常数项, $\beta_1, \beta_2, \beta_3, \beta_4, \gamma$ 分别表示语言要求、语言监督、方言惯性、玩伴语言、系列控制变量的系数, $C$ 为系列控制变量的符号, $\varepsilon$ 为误差项。为了解决语言要求、语言监督和玩伴语言等三个变量的分布数值呈右偏态的问题,本文借鉴 Rossi(2005)的方法,将变量均加上1,然后取对数。

首先对解释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除了方言惯性与监护人受教育程度、语言要求与父母受教育程度在较低的水平上显著正相关,其他解释变量之间均不显著,相关系数较低,整体上解释变量间相关性较弱。同时,对方程进行了逐步回归分析,发现没有变量被剔除,说明各变量的选取是比较合理的。这共同说明了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由于语言监督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因此,将全样本回归模型设为两套,即 Porbit 与 IvPorbit,采用工具变量法对第二套模型进行二阶段回归,并使用 Wald 检验法判断语言监督是否内生,零假设是变量为外生,检验结果显示 IvPorbit 模型结果中所有的 Wald 检验值均为 0.10 水平以上的统计显著,外生性检验接受了 IvPorbit 结果,即表明 IvADays 不存在内生性,因此,本文最终接受 Porbit 模型的回归结果。并采用 LR 方法对 Porbit 模型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模型接受同方差假设。

### 2. 语言态度、语言环境对普通话使用的影响

在 Stata11.0 中对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以探讨父母的语言要求、语言监督、监护人的方言惯性、儿童玩伴的语言使用等因素对农村学前留守儿童使用普通话是否有影响,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限于篇幅,控制变量回归结果略)。

表7显示,父母的语言态度积极影响儿童的普通话使用,语言要求和语言监督两个变量的影响结果均显著正相关;语言环境的两个变量对普通话使用的影响结果有差异。(1)语言要求在0.01的水平上高度相关,系数为0.311,这表明,父母对监护人和儿童使

表7 语言态度、语言环境对儿童普通话使用影响的回归结果

变量与参数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截距	0.259**	0.474
$\ln(1 + YYQ)$	0.311***	0.338
$\ln(1 + YYJD)$	0.152*	0.290
FYGX	-0.447***	-0.735
$\ln(1 + WBYY)$	0.109	0.243
观察值	679	
Adj. R <sup>2</sup>	0.388	
F值	10.656***	

注:\*、\*\*、\*\*\*分别表示在10%、5%、1%水平下统计显著,括号内为标准误。

用普通话的鲜明主张是儿童使用普通话的重要影响因素。如,父母的一方不会讲方言,则要求子女掌握使用普通话,以利于将来共同生活的交流之便;又如,父母在较体面的单位工作,不希望孩子使用方言,以免显得“土气”。监护人往往不愿意违背父母的意愿,在单独带孩子的过程中,克服方言惯性障碍,选择使用普通话。语言监督在0.10的水平上显著相关,表明父母经常与监护人通电话或视频,并与儿童用普通话聊天,能有效促进儿童选择使用普通话。可能的原因有两点:一是父母长期坚持与孩子用普通话交流,会间接影响监护人的语言态度,部分监护人因此较多地使用普通话;二是父母与孩子用普通话交流的频度越高,孩子在接受语言输入的过程中选择使用普通话的概率也越大。(2)监护人的方言惯性与普通话使用在0.01的水平上显著负相关,且系数高达0.447。这表明监护人的方言惯性越大,儿童使用普通话的可能性越小;监护人方言惯性越小,儿童越有可能使用普通话。监护人是儿童学习和使用语言的最主要的输入渠道,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语言环境的另一个变量,玩伴语言与儿童使用普通话之间呈非显著正相关关系,这表明儿童的使用普通话的玩伴对该儿童选择使用普通话没有什么影响力度。原因是,儿童的玩伴一般有多个,个别使用普通话的玩伴的语言同化力度不强,且儿童与这一类玩伴呆在一起的时间毕竟较少,难以受到深刻的熏陶。

### 3. 语言要求与方言惯性的替代效应

从表7看,父母的语言要求与监护人的方言惯性对儿童使用普通话有很强的冲突性,即一方面,儿童的父母要求监护人采用普通话与儿童交流,积极促进儿童使用普通话;但另一方面,监护人的方言惯性很强,还是习惯与儿童讲方言,导致儿童使用方言。基于此,本文借鉴张敦力和李四海(2012)的方法,进一步建立含有交叉项的Probit模型,来检验语言要求与方言惯性之间是否具有替代效应。模型如式(2)所示:

$$Probit(YYSY) = \alpha + \beta_1 YYYQ + \beta_2 FYGX * YYYQ + \beta_3 FYGX * (1 - YYYQ) + \gamma C_i + \varepsilon_i \quad (2)$$

当YYYQ为0时,即父母没有提出监护人与儿童讲普通话的要求,则式(2)变化为式(3):

$$Probit(YYSY) = \alpha + \beta_3 FYGX + \gamma C_i + \varepsilon_i \quad (3)$$

当YYYQ为1时,即父母提出了监护人与儿童讲普通话的要求,则式(2)变化为式(4):

$$Probit(YYSY) = \alpha + \beta_1 + \beta_2 FYGX + \gamma C_i + \varepsilon_i \quad (4)$$

式(3)和式(4)对等时,得到系数 $\beta_2$ 小于 $\beta_3$ ,意味着父母要求监护人与儿童使用普通话交流时,监护人的方言惯性对儿童使用普通话的影响力度会被削弱。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

表8显示,当YYYQ为0时, $FYGX * (1 - YYYQ)$ 的系数绝对值和显著性水平明显都要高于 $FYGX * YYYQ$ ,表明父母没有提出语言要求时,监护人的方言惯性对儿童选择使用普通话的负向作用非常明显,即儿童的语言选择方向上明显依赖监护人的方言习惯,倾向于使用方言;当YYYQ为1时,YYYQ的系数绝对值比交叉项 $FYGX * YYYQ$ 要大,表明父母提出语言要求时,监护人的 $FYGX$ 对儿童选择使用普通话的负向作用变弱了,即父母的普通话要求冲抵了监护人方言惯性的力量,儿童在选择语言的过程中,没有那么依赖监护人的方言习惯。

表8 语言要求与方言惯性的替代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与参数	回归系数	标准误
截距	0.274 **	0.766
YYYQ	0.317 *	0.479
$FYGX * YYYQ$	-0.191 *	-0.338
$FYGX * (1 - YYYQ)$	-0.501 ***	-0.720
观察值	679	
Adj. R <sup>2</sup>	0.413	
F值	10.835 ***	

### 4.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上述分析结果的可靠性,本文做了两次稳健性检验<sup>①</sup>。第一次检验中,选择第二期调研中电话追踪的446个样本的控制变量数据,同时将这些样本对应的第一期访谈的语言要求、语言监督、方言惯性、玩伴语言等四个主要解释变量的数据作为滞后一期变量,重新采用文中的方法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发现,语言要求的显著性水平降低为0.05,其他主要解释变量没有变化,父母的受教育程度的显著性水平提高为0.05,其他控制变量变化不明显。第二次建立Logit模型进行检验,并分别使用进入回归和逐步回归分析,发现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与表7和表8均无明显差异,个别控制变量结果稍有变化。稳健性分析结果表明,本文的实证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 五 结论与启示

本文对农村学前留守儿童日常生活中主讲普通话还是方言的影响因素做了研究,着重分析了儿童的父母对儿童选择主讲普通话还是方言的主张、父母是否经常与监护人和儿童联系并督促普通话的使用、监护人方言惯性的力量、儿童玩伴的普通话使用情况等四个因素对儿童语言使用的影响。结果发现,父母要求监护人使用普通话教育儿童的主张和持续的监督行为是儿童选择使用普通话的关键影响因素,监护人的方言惯性也十分有效地促使儿童选择使用方言。进一步研究发现,父母的普通话主张与监护人的方言习惯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即父母没有提出使用普通话的要求时,儿童明显依赖监护人的方言惯性而使用方言,父母提出使用普通话的要求时,儿童依赖监护人的方言惯性而使用方言的作用大大减弱。

研究启示有:第一,在农村学前留守儿童的普通话学习和使用过程中,父母的语言态度起着关键作用。父母对普通话使用的意识与主张,能够较好地冲抵监护人的方言惯性的力量,从而积极促进儿童使用普通话。因此,要想提高农村学前留守儿童的普通话使用能力,父母的普通话意识与要求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在儿童使用普通话之后,监护人及其他成年人在语码转换上往往倾向于迁就儿童,选择使用普通话(游汝杰,2006),这就促使儿童形成普通话的使用惯性。第二,父母应尽可能地与监护人及儿童保持语音联系,尤其是争取更多时间的相处。这样,父母的普通话监督效果较佳,能在亲情融洽的氛围中促进儿童对普通话的吸收与使用。

以上启示均有一个前提,父母的语言态度是积极要求和支持儿童学习和使用普通话。但事实上,我国农村的外出务工父母中持有这一态度的比例偏低,加之监护人的方言习惯和生活环境等因素,使得农村学前留守儿童学习和使用普通话的内外在环境并不理想。因此,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进程中,加强对成年人的普通话普及教育是更为重要的。

### [附注]

① 稳健性分析结果略,可根据需要提供。

### [参考文献]

- [1] 邓玉清. 1~3岁留守儿童语言发育迟缓的临床干预分析[J]. 深圳中西医结合杂志, 2016, (2).
- [2] 伏干. 父母外出打工对农村儿童语言使用影响的研究——以江苏省阜宁县为例[J]. 语言文字应用, 2016, (1).
- [3] 姜玉荣, 蓝雯倩. 4~6岁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调查[J]. 开封教育学院学报, 2016, (2).
- [4] 文湘兰. 1~3岁留守儿童语言发育迟缓干预效果探讨[J]. 实用预防医学, 2013, (10).

- [5] 游汝杰. 方言和普通话的社会功能与和谐发展[J]. 修辞学习, 2006, (6).
- [6] 张敦力, 李四海. 社会信任、政治关系与民营企业银行贷款[J]. 会计研究, 2012, (8).
- [7] 周家玉. 农村留守儿童语言沟通能力障碍分析及小学语文教学对策[J]. 教育教学论坛, 2014, (16).
- [8] Arunachalam, S. A new experimental paradigm to study children's processing of their parent's unscripted language input [J]. *Journal of Memory and Language*, 2016, 88: 104 - 116.
- [9] Atkinson, M. Language learning and the linguistic environment [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82, (1).
- [10] Herrera, A. M., Minetti, R. Informed finance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Evidence from credit relationships [J].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2007, (1).
- [11] Maccoby, E. E., Jacklin, C. N. *The psychology of sex differences* [M]. Stanford/ Londo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 [12] Rossi, S. Patents, capital structure and the demand for corporate securities [J/OL]. *Working paper, www.ssrn.com*, 2005, (9).

## 全国高等院校现代汉语教学研究会第十五届 学术研讨会在桂林召开

2016年12月9~11日,由全国高等院校现代汉语教学研究会主办、广西师范大学和浙江师范大学共同承办的全国高等院校现代汉语教学研究会第十五届学术研讨会在桂林举办。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学、中山大学等97个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142名专家代表参加了会议。与会代表围绕“现代汉语教学”这一中心议题,深入探讨了语言理论多元化、教学手段多样化、人才培养多层次化背景下现代汉语教学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开幕式上,广西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赵铁教授代表承办单位致辞,著名语言学家、北京大学陆俭明教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研究会会长张先亮教授代表学会欢迎大家参会,并从人才培养、教学内容、教材、教学手段等角度对现代汉语教学面临的新问题提出了一些较为宏观的思考,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陈小燕教授介绍了学院的基本情况,开幕式由研究会副会长樊中元教授主持。

来自内地和香港的15位教授作大会报告。主要围绕三大块内容,一是现代汉语教材建设的整体问题,二是现代汉语课程的现代化问题,三是具体知识板块的教材编写和教学策略问题。报告话题引发与会者强烈共鸣,讨论激烈。10日晚上的现代汉语教材专题讨论会上,全国高校当前影响较大的几套现代汉语教材的主编畅谈编写思路、教材特色、疑难问题、远景规划。会议还分四组进行分组报告和讨论,主题广泛,针对性强,富有成效。

闭幕式由副会长兼秘书长陈青松教授主持,学会名誉会长邵敬敏教授作大会总结。本次学术研讨会是在人才培养、语言生活和教学手段等方面均发生新变化的形势下召开的一次大会,对提高现代汉语教学水平、促进现代汉语教学事业的发展 and 繁荣具有重要的作用。

(秘书处)